形塑一個新而美麗國家的文化視野—「台灣文化的重建」研討會專題演講

●李敏勇／現代學術基金會董事長、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文教人權委員會委員

陳董事長、在座的各位先進、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大家早。很高興有這個機會，在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主辦的「台灣文化的重建」研討會，跟大家交換意見。

記得大約十年前，我擔任台灣筆會會長的時候，正巧陳隆志教授也剛好回國內，我邀請陳教授在筆會的一次餐會中，發表一場國際法與台灣國家獨立的問題專題演講。陳隆志教授回到台灣，積極籌辦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基金會成立之後，對台灣問題都很關心，常常舉辦研討會。在今天研討會籌備時，我們交換想法跟意見，融入在研討會主要四個課題中討論，當然這也反映出我思考台灣文化課題的某些意見。今天，要向大家報告的是我對文化議題的想法，和我們思考台灣文化重建的問題時，需要思考的幾個方向。

我一向把文化問題放在政治、經濟結構上來看。關於文化層次的問題，有的可以分得很細，有的把它當作生活的一部份，所有的東西都是文化的問題。我們有必要把它放在結構上來看。我認為社會結構，主要是經濟和文化面上，也就是透過物質的經濟條件和精神的文化條件構成社會實質，然後再結合政治的關聯條件，這三種組合在一起的時候，就形成一種社會觀察、國家內部很重要的視點。

台灣二十世紀經過兩個外來統治者的統治。在邁向新的世紀，政黨輪替之後，台灣進入一個全新的時代。但我們看到，站在以台灣為主體的立場，關心國家未來的重建時，並未能明確看到我們國家未來的前途。這個問題到底出在哪裡？有人透過經濟的角度來看，我們的台灣社會比較重視身體論的社會。政黨輪替之後，正巧遭遇到前所未有的經濟發展與成長的困境，不論是從社會層面或是政治層面所反映出來的問題，我們所面對的以及新政府所面臨最重要的議題，好像只是經濟問題，所以常常可以聽到台灣社會一個特別的詞語－拚經濟，因為我們的社會十分關心經濟的發展。不過，我認為只關心經濟發展，並不能解決台灣的問題。因為我們爭取台灣文化問題的發言權，並不是只在台灣內部用於取代國民黨舊體制的政治勢力。事實上，是要看教育、大眾傳播，整體的台灣文化權仍舊是背離台灣做為主體的發言。這種情形若不能解決，我相信台灣要建構一個真正屬於我們且所需要的新國家將有相當大的困難。所以，我們除了要拚經濟、以及政治事務選舉的課題關心之

外，還要回來思考文化的條件，形成一股以台灣為主體，具有新的、建設性的，可以去做充份解釋，去發揚推動和台灣人民，共同發揮國民意志和感情，來建設新國家的文化關聯。

我以這個角度來與大家一起討論、關心這個課題。今天這個文化重建的研討會，我建議基金會用四個主題為主軸，邀請相關專家、學者以及關心的人。我就透過這四個議題的主要面向，來跟各位討論我的想法：

第一、我認為台灣文化重建的問題重要課題之一，就是傳統與創新的問題。根據有文字記載的台灣歷史 ── 也就是我們所說的台灣人四百年歷史。但我們只要將這些歷史向前推移，台灣真正的傳統必須以原住民作為基礎，然後早期的河洛人、客家人，從唐山帶來漢人的傳統，以及1895年台灣人被日本人殖民統治的日據時代的傳統，一直到1945年日本人戰敗結束殖民統治後，國民黨政府來台灣接收所形成的戰後中國式、中華式統治的傳統。

事實上，我們的傳統不是單純一個國家形式所累積下來的，剛才所提到的，包括原住民的傳統、早期的河洛人、客家人的漢文化傳統，也有台灣在日據時代所形成較接近現代化的傳統，最後還有1945年來，所有的中國，以中華作為中心所涵蓋很多中國大陸各種民族傳統的東西都來到台灣。

台灣內部有很多不同的傳統文化累積，但是在變遷當中，形成一個很特殊的東西，就是看起來像是針對傳統事務的迷戀，或是對傳統文化的無法割捨；另方面看起來卻又不是很清楚與穩定，並形成一種對傳統基礎的愛護。因此，表面上看起來，我們好像具備很多傳統的文化條件，但是歷史變遷卻使台灣文化與外來文化做接觸時，本身無法形成一種清楚、穩定、有效或是使我們對本身有光榮感的傳統，這是台灣文化裡一個很特殊的問題。這個特殊問題有其特色，一方面像是很容易接受新的東西，但是它又形成一種危險性，就是在接觸新的東西時，沒有自己傳統基礎的選擇，很容易因為外在任何東西，自我性的面貌則會不見。

台灣有很多複雜的傳統，但是沒有真正形成台灣傳統的東西。所以，台灣文化遇到紅就紅，遇到綠就綠，可以說是放棄台灣自己主體性的延續，接觸新的東西也不是真正有創新的條件，看起來很守舊保守，對新的事物、表面的東西，很容易影響台灣社會的形貌。

不只是政治變遷而已，受到近五十年農村及農業為主的社會條件，進入都市化、工業化社會的影響。在農業時代的鄉村條件，人和土地間的聯繫，對傳統的文化保存，具有草和樹木之類所謂定根的條件，但是在都市化、工業化之後，人和土地對傳統疏離的情形，因此我們必須面對工業化、都市化後變遷的條件，並找出我們的傳統。

在都市化之後，產生一種特殊的現象，就是在初一、十五，不論多新多進步的商店，都會在屋簷下燒香拜拜。這種傳統形式在都市化、工業化之後，沒有辦法將這精神轉化為新的面貌，這是我們要思考的問題。我們需要建立一個以原住民作基礎，台灣早期的河洛人、客家人形成的漢人傳統，日據時代在台灣形成，甚至戰後新的住民進來，所形成的傳統基礎後，要形成一個有真正傳統創新基礎的文化條件，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課題。這個課題一

旦形成之後，我們就可能有傳統台灣特色的東西，其中既有創新，然後又不會將戰後台灣傳統文化的解釋，都變成中國式的文化思考，我想這是第一個很重要的課題。

第二是本土化與全球化的課題。我們知道台灣對抗外來的統治，有一項很重要的政治和文化的語言就是本土化。本土化這種東西，本來是相對於被外來化，被外部勢力剔除自己主體性重建的一種語言，但是本土化，如果沒有被充份思考時，它的意義就受到侷限。我們知道戰後的國民黨在台灣推行中華文化。表面上是推行中華文化，事實上戰後的國民黨統治，在人民的生活裡，常常是美國化。因此，官方或是在台灣國家條件下，中華文化這種概念，在教育或大眾傳播中，特別是教育則是讓我們中華文化的中華化。但是人民或是台灣社會的生活條件，則隨著以美國為中心的外國關係變遷。事實上，一方面是中華化，另一方面則是美國化。中華化讓我們台灣人民思想、價值、內部的精神是中國式，但是實際的工業化、都市化、現代生活條件，則是沒有辦法在生活中去實踐。因此，台灣人民的教育、台灣國家本質上好像提倡中華文化，但是生活的條件卻是美國化，是以美國化來代替世界化。我相信戰後台灣所受到的外國影響，是美國化。

同時，我們在戰後國民黨化過程當中，起初是將台灣用中華化來剔除日本統治台灣五十年的時間，台灣受到日本化，那時的日本化事實上是歐洲化。所以，台灣戰前可以看出，很多戰前日據時代所養成的知識份子跟文化人，甚至那時候的企業界或是社會各階層的人來看，那時候日本化事實上是透過日本化的歐洲化。我們知道日本自維新以後對日本近代的影響，日本統治台灣時的日本化則是歐洲化。所以，國民黨的中國化主要是將台灣被日本人統治五十年，當時透過日本化而間接促成的歐洲化。國民黨統治以去除殖民統治，也就是視日本殖民文化為一種毒瘤的角度，一一剔除。台灣人在一百年內，兩種殖民統治政權底下，在台灣形塑自身文化上……。我們可以發現父執輩們是受日本化－歐洲化影響的知識份子；但是戰後國民黨的中國化－美國化成長下的這一代，其形塑台灣文化條件的能力，被外來政治勢力所撕裂，使得我們與父執輩出現斷層，同時自己也與下一代出現斷層，將外來統治遺留的痛苦歷史經驗，變成自己文化資產的條件。所以，遇到二十一世紀全球化的聲音喊得很響的時候，出現很多對台灣主體性壓制的聲音－他們認為現在是全球化的時代，以全球化的聲音來壓制台灣本土化重建的要求。事實上，他們所說的全球化常常只是指中國化。尤其，認真思考現在很多壓制台灣本土化聲音或勢力背後，其所指的全球化，有時候不是真正的全球化，那個全球化事實上是以中國的引力，來做為中心的全球化，表面上他講現在是全球化的時代，但事實上，他是避免不讓我們對台灣自己本土化有較深層的思考，他所要的是我們去接受中國化的引力。

中國化的引力，在早期國民黨統治的時候，是以中華民國國民黨為主體所宣揚的中國文化，而現在所講的中國文化，是以現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中心，所形成的中國文化觀念，這產生一個很諷刺的問題。台灣有個叫做「中華文化復興總會」的機構，這是中國文革發生的時候，在台灣的蔣介石，他用復興中華文化為號召，產生一個以台灣的中華民國和中國大陸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不一樣的文化運動。按往例都是由歷任總統擔任這個機構會長，陳總統現在就有這個位置。他當然會想如何用這個機構來做台灣文化事務，但其本來形貌是復興中華文化。中華文化在台灣的義理，應該放在正常的全球化看法脈絡下來看，不可以把全球化這種東西放在中國化的意思裡看全球化，我想這是角度的問題，而且全球化程度愈深，台灣想要在全球化的脈絡下，與世界其他國家進行連結，在世界條件在其他國家站起，台灣要成為一個讓人看得起的國家，就要具備本土化的特色。

用本土化的立場去面對、迎接全球化的時代，並不是剔除自己的本土化，也不是不顧全球化的趨勢，只守在本土化的口號。這是一個課題，有一個客觀性的考驗，我們必須以本土化來思考時，來突破中華化的影響，來和全球化的觀念接軌。這是我們台灣文化環境裡面一個較大的問題，和我們傳統與創新的情形一樣。

第三、近現代國民意識的問題。我們知道，台灣人一直在殖民地統治的影響之下，沒有屬於自己的現代國家國民意識。早期台灣人被日本統治之前，早期的祖先來到台灣，原住民的部落並沒有形成現代國家的觀念。早期的祖先從唐山來到台灣之後，形成一個經濟型的生產開墾的社會，移民者在台灣並沒有形成建造或有機會建造一個國家條件那種文化想法。因此，我們台灣的國家條件，事實上是被國家化的國家條件，1895年日本接收台灣進行殖民地統治之後，當時在台灣形成一個類似國家的感覺。那個時候有近代文化的影響，讓台灣瞭解到近代國家的想法，但是我們也還是在被殖民統治的情形之下。之後國民黨統治時，也一直跟我們講，他讓我們有一個國家，他讓我們有一個什麼樣的國家條件？國民黨讓我們有一個在中國大陸被推翻，隨後流亡到台灣，且在國際政治現實裡，沒有辦法確立的國家條件。所以，台灣的住民對形成國家這種想法，並沒有很清楚、或積極的投入，展現作為國家主人主體性權利跟責任的感覺。

所以，我們看到戰後台灣的經濟社會條件，形成一個較強的經濟條件之後，很多台灣人便到其他已經建造好的國家，像是美國、加拿大，甚至澳洲、紐西蘭等國家，去參與建設別人國家的陣容，做別國的國民，這些人的能力本來是最有條件為台灣共同創造新的國家的社會條件，可惜的是，我們並沒有。為什麼沒有？我覺得台灣的社會文化一直延續過去經濟發展的移民社會裡，台灣人僅是努力創造經濟生產裡所累積的財富，然後他對台灣自己的國家、土地，是不是應形成一個確定性的國家條件的這種文化感覺是不充份，所以他寧可在這個地方，願意付出很多努力，以便能參加別人的陣容，譬如說去做美國人、加拿大人、紐西蘭人、澳洲人，我想他對台灣也有危機和不安定的感覺。但是，在台灣的人包括從台灣出去的人，是不是真正有產生現代國家的國民意識，並把國家當作國民主體的權利跟責任的感覺，一方面是權利的感覺，一方面是責任的感覺，在這個地方真正建構一個國家，我想關於這部分是沒有的。對此，我的解釋認為某種程度應歸屬於文化問題。我們常看到台灣政治改革運動的力量，取代舊體制的政治權力後，其最大的改變是感受到權力位置的改變。因此，改革運動者爭取到權力的位置。遇到國家形成產生困難

的時候，表現出不協調、不接觸、不突破台灣形成自己的國家那種文化上的解釋，無法讓台灣的國民很清楚的認知到，台灣自己形成國家條件，事實上是近代世界二、三百年以來，相對於以前君權國家、神權國家，表現內涵不一樣的民權國家，人民有這種權利跟責任，作為國家的主人，這種文化力量，確實是產生國家條件。國家不是靠拚經濟可以創造一個國家，國家是一種文化方面的永續，也是文化力的實質，在近代國家包括主權獨立的國家條件，或是以人民作為國家主體的民權國家的條件，某種程度都是文化方面的產物，就是國民意識到國民是國家的主人。所以，國家的形成、國家會變成什麼樣的國家，事實上是由國民的權利跟責任，共同支持出來的樣貌。我們應該從這些條件裡面去思考台灣被殖民的困境。否則根據台灣最近發展的趨勢，中華化已經被國民黨的政權移轉變成中華人民共和國共產黨的政權，他們共同去拿的那個旗子。所以，很多在台灣受國民黨影響之下，本來很反共，對中國有敵意，這種敵意是根據國民黨裡的政治解釋，本質上，我們不是要從文化上產生一個很積極或極端絕對的敵意，但是有很多在台灣國民黨所形成的中華化，很簡單、很容易就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所接收，認同共產黨所形成的廣泛的中華文化。這種東西有繼續台灣被殖民的統治，無法形成台灣國家條件的危險性。所以，這是我們在台灣看到的，政黨輪替之後，我們的教育沒有辦法很清楚的改變台灣的歷史感、地理感，甚至台灣人被中華文化給我們的中華化、外來化的東西，產生變化嚴重的原因。

第四、文化的志向問題。台灣是非常重視經濟發展，非常重視物質生活，這也反應出早期的移民過程中生活的困難。但是，因為生活的困難再加上我們自己沒有主體性的外來殖民地統治條件之下，對政治的無能為力的感覺，使得我們必須尋找一個發展的出口。當然我們最大且具體的成就，就是經濟發展的成就。所以，台灣最能感動人的口號就是拚經濟，台灣的政治發展最大的壓力就是要把經濟搞好，但是重視物質生活的國民，就像一個人只重視他自己的身體而已，他的心靈和精神沒有積極光輝的時候，這種國家無法成為一流的國家，這樣的國民也無法成為一流的國民。

我們看日本明治維新之後，看世界很多國家的經濟發展跟我們比起來，或從經濟生產來看，他們的物質條件不一定比我們充份。但是我們看外國人實際生活裡的文化內容，包括閱讀、音樂、美術等廣泛的文化生活，除了食衣住行物質享受的豐富性以外。我們重視物質條件豐富性的追求，這是台灣非常嚴重的問題。日據時代，當時很多台灣人所養成知識份子，他們投入閱讀、美術欣賞、音樂欣賞等文化活動，他們在裡面形成文化生活的想法與目標，當社會存有這種目標時，才可以把這個社會建構成一個內容豐富、充實的社會，也才能讓人脫離動物性的條件、生物性的條件，進入真正嚴格哲學意義下所稱的人。

我們台灣人需要把文化放入經濟、政治、社會結構條件來看，我們也需要去思考政治運動裡進展的難題，重新去思考台灣面對歷史發展直到現在，如何建立自己的國家，也是一流的國家。現在台灣的國家問題有幾種條件，自己則還沒有很清楚界定法理上的國家，法理上的國家是很客

觀的法律條文，並以理性判斷，是否符合國家的條件，然而建立一個優秀的一流國家，則是超出客觀上你是不是一個國家，我想我們的考驗不是一層的，我們的考驗是雙重性的，甚至多重性的。我們國家的重建需要有社會改造當作條件，而在社會改造中我認為很重要的部分，就是從經濟的角度，回過頭加強我們對文化問題的思考。

台灣每次一到選舉的時候，早期台灣都用主體性的政治條件去改變或推翻不義不公的外來統治勢力，看得出那時是形式權力的改變。但我們看獲得執政權的新政府，他們被台灣社會要求要將台灣的經濟振興起來，我認為這樣子作並不夠。我們需要從文化層面來思考，讓台灣人不但對人，台灣人是什麼？做一個人，具備精神上與文化上作為人的條件，然後再進入所謂的台灣人的境界，擁有我們特殊的歷史、地理條件、時間空間與傳統條件，然後當進入台灣的國民條件時，則具備國家契約的關係，在這新的國家契約裡，我們的權利跟責任很重要，然後還有一點不可忽視，在全球化的時代，世界公民這個觀念。我們的文化需要澄清對人、台灣人、台灣國民跟世界公民的觀念，以開拓我們的視野，追求我們的目標，與思考我們的挑債。

最後，我要引用捷克的詩人塞佛特（J. Seifert, 1921-1986）的詩，他有一首詩名為「布拉格」。在這次台北市長的選舉中，我說過以台灣這種社會文化條件，我們的選舉並無法讓國民感受到，我們擁有真正的市民精神，追求一個新的政治實體，因為我們的社會還在很低的物質層次裡煩惱或是高興，我們沒有較高層次文化的高興與煩惱。我們知道布拉格是1967年的布拉格之春，和1988年之後布拉格在東歐的民主運動裡，捷克人改變統治體制。在捷克布拉格有一間咖啡廳，它的菜單上印有1984年獲得諾貝爾獎的捷克詩人塞佛特所寫的一首詩──「布拉格」

美麗的都城，當你的披風
被吹開，展現你的紫色風華，
我是這般愛你，雖只能用言語，
遠不及那些手持武器的人說得多。

是的，因此我們眼淚很多，
落下時弄鹹了我們的麵包。
亡者的聲音在我們淚中迴響，
亡者呼喊的聲音。

他們躺在我們的街道上，
我羞愧那天沒和他們在一起。
英勇的美麗都城，
那天，你的美麗更為榮光。

我們要建立一個國家，讓這個國家變成漂亮的國家，是一個光榮的國家，我們需要突破國民黨統治的中華文化的迷思，我們需要以本土化的條件為基礎，也有全球化的視野，站在重建我們台灣人的意志跟感情的角度，來重建追求我們台灣人的出路。今天一整天的研討會，透過很多學者專家和朋友的討論，一定可以提供我們思考台灣的國家重建的過程中很多的課題，期待我們的台灣，包括所有對台灣前途有充滿期待的人，共同發出我們思考台灣文化重建的聲音，希望台灣政治改革運動的朋友，可以思考文化的需要，讓我們台灣走向真正國家條件，一個很美的國家，一個光榮的國家。多謝大家！

（2002年12月21日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主辦「台灣文化的重建」研討會專題演講，蘇芳誼記錄整理）◎